

雷、破碎和创伤

“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台湾脱离日本统治。”日本投降了。收音机里传来滋滋作响的电流声。红布虚掩着昏黄的房间。女人的呻吟和婴儿的哭啼交织。

《悲情城市》其实是很直白很坦率的一部影片，无论是人物刻画、拍摄手法还是画面和语言，都将导演所想展现的内容直接呈现在了这四方荧幕上。就像开头给出一目了然的故事背景——一个民族迎来了转机，一个家庭接生了未来。

政权的更替似乎没有让台湾靠岸，而是从一个泥潭掉进了另一个。

太阳旗降落，青天白日旗升起。废弃的太阳旗被节俭的女人裁作孩童的衣服，知识分子站在窗前合声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日本女子送给宽美自己最珍视的和服。

再后来，台湾宣布戒严。医院里常有头破血流的人，举着火把的黑帮和抬着杆枪的士兵常追到医院门口，林氏一家的四个儿子命运殊途，知识分子奔走逃亡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联系散落一地，空气中飘着压抑、血、死亡、眼泪、争吵、雾、枪响。

无论是外省人的到来，还是国民党的压迫，台湾这片土地在这期间总是混乱的，这种混乱不仅是社会结构上的，也是台湾人民内心世界的。上海人来做走私，国民党滥杀无辜，嫁祸污蔑横行。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“白色恐怖”时代，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，人民被扣上“汉奸”帽子，政治异议人士被逮捕、囚禁甚至处决。

“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，随便他们翻起翻落，我们本岛人最可怜，一下日本人，一下中国人，众人吃，众人骑，没人疼。”林家长子林文雄这么说。

婴儿出生的时候镜头给到了孩子的父亲——林文雄。家里刚通电，他骂了一句，把遮着电灯的布一角一角地拉起来。后来孩子被取名为林光明。

影片总体采取了宽美的视角来叙述这个阶段的林氏家族故事——通过她写日记的习惯。她是林氏家族里的外人，也是医院的护士，连接着影片最重要的两个场景——家族和医院。她不参与政治活动，有时像个旁观的上帝视角；但

她参与着林文清和宽荣的情感世界，亲情和爱情的成分让我们短暂地恢复感受人性的能力，在走进悲剧深处的同时不至于感到过于冷寂和绝望。

林文清聋人的身份设置常被人评作影片极妙之处，在我看来，林文清因为耳障而与宽美进行的纸笔交流是最触动人的设计。

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，这是一个嘈杂的台湾。酒家开业的鞭炮声响彻云霄，收音机播报不停，舞狮舞龙，锣鼓喧天，戏台上唱戏，拉二胡唱曲，广播喊着一阵又一阵的“台湾同胞们”，挥刀刺入肉，枪鸣人倒，哭泣哀鸣和庆贺吆喝夹杂。

我们所听到的丰富的声音，是反映事实最快速的表现，但是林文清全都感受不到。

他被抓走囚禁在牢里，两个同胞被叫走“开庭”，他在窗口茫然空洞地张望，然后两声枪响，重回寂静。士兵又来了：“林文清开庭。”他听不见，直到看见没有人动身才出去。

宽美的书信日记，总是以黑底白字的画面出现。“同运的樱花，尽管飞扬的去吧，我随后就来，大家都一样。”这是一个少女青春思绪的故事；“今天下午，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，声势很大，一阵又一阵，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。”这是林家分崩离析后的平静；“阿谦已经长牙了，笑的神情很好，眼睛很像四叔。有空来家里走走，九份开始转冷了，芒花开了。满山白蒙蒙，像雪。”这是苍白余生里的交流。

宽美用最素净的文字描述着环境的变化、人的变化，就像一股缓缓流动的泉，从纷争吵闹、聚散离合的旁边绕过。纸笔的客观性让我们抽身于故事，而文字的情绪又让我们难以脱离，这种影片和观众的交流，富含了挣扎的意味。

整支影片很长，拍摄时用了大量的长镜头、固定镜头来叙事，从而写实度和完整度都很高，常常能看到某一个人斟茶倒水的全程，也有拉二胡唱戏的大段画面，还有在长长的土路上一直行走，云雾缭绕的山头等群鸟飞过。

镜头常常不对准脚本里的主角，俯拍绵延的山路，村里的炮竹舞狮，宽荣和林文清争执参与政治活动的片段镜头在拍擦桌子的女人，林文雄中枪前的追逐戏把镜头对向了前景里打电话的人。这种融合了平淡和高潮的画面具有强烈的矛盾性，让人对这些内容更为专注的同时也更有空间思考。

《悲情城市》如片名，展现了一个布满创伤的家庭，一座千疮百孔的城市，一种矛盾无力的情境。那个时代的悲情，浓缩在一个个真实的人生中，聋人也难逃政治迫害的爪牙。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剥削都把台湾扎扎实实地压在低谷里，城市只剩一个沧桑又动荡的外壳，就如片中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，与其说是政府治理，不如说是一个公司。

侯孝贤曾说：“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：平易，非常简单，所有的人都能看。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，非常深邃。”

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大陆易守。国民政府迁台，定临时首都于台北。”林家的彩色玻璃屏风前暗暗的，没有光亮，也没有人。